

阿尔诺·盖格尔作品中现代奥地利人的身份认同危机

张子菁

四川外国语大学

DOI:10.12238/er.v3i10.3270

[摘要] 贯穿奥地利作家盖格尔作品的重点是奥地利人的身份认同危机,不同时代背景下,认同危机表现出的形式也不尽相同,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盖格尔笔下的奥地利人虽然展现了重重身份认同危机,但他也将解决方法隐藏于危机中。

[关键词] 身份认同; 危机; 现状

中图分类号: F830.99 **文献标识码:** A

在盖格尔的作品中,展现了形形色色的奥地利人的生存状态。盖格尔通过描写这些现代奥地利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宗教观和爱情观,将对现代奥地利人形象与奥地利国家、社会、周围人的关系及其命运走向的思考融进作品中。国内外对盖格尔作品的研究迄今为止并未以身份认同问题为主题。因此本文拟探讨盖格尔作品中涉及的身份认同问题,关照其所代表的文化意义,并尝试发掘分析作品中解决身份认同危机的途径。

1 盖格尔作品的研究现状

奥地利作家阿尔诺·盖格尔出生于1968年,大学期间专业为德语语言文学、古代史和比较文学,自1993年起成为自由作家,2005年凭借《我们过得还行》获得首届德国图书奖。从辉煌的奥地利帝国、奥匈帝国到被纳粹德国合并,1943年《莫斯科宣言》中将奥地利定义成是纳粹的第一个受害者。奥地利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因而奥地利人的身份认同问题颇受文学研究的关注。奥地利的身份转变过大,带来了现代奥地利人的极端反应。这也意味着,奥地利缺少类似德国的战后反思。原本应该是盖格尔父亲一辈人的任务落到了盖格尔一辈的肩上。与德国战后兴起的废墟文学不同,奥地利68年后出生的新生代作家有不同的任务,探寻和反思和取代激烈抨击,使命感被更多的私人情感取代,他们笔下

的历史变得可感受、更可信。盖格尔作品中的角色体现了作者对现代奥地利人细致入微的观察、描写和总结。通过研究他们的身份认同问题,可以对解决现实中的现代奥地利人身份认同问题提供一定总结和帮助。

在国外,对盖格尔作品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将《我们过得还行》、《流放的老国王》和其他的德国或奥地利家族小说对比其互文性或叙述的独特之处,分析其中的记忆母题、父子关系并对此进行文学阐释,家族作为国家、民族的历史缩影的重要价值等。主要有: Verena Auffermann在《时代》报上发表的《该说些什么: 盖格尔拆解一个奥地利家庭》; Ulrich Rüdener(2005)在《每日镜报》上发表的《在家族的坟墓里: 阿尔诺·盖格尔大作时代小说〈我们过得还行〉》等新闻和书评外,还有Maria Bryk的《从同时代的家庭/代际小说角度来看阿尔诺·盖格尔〈我们过得还行〉》。Rafal Pokrywka(2013)的《代际小说作为历史过渡的展演》。Julia Freytag(2007)的论文《“谁了解奥地利”——讲述家庭故事: 阿尔诺·盖格尔〈我们过得还行〉和伊娃·梅娜思〈维也纳〉》等。

国内近年来,对奥地利文学作品的关注度持续上升,盖格尔的作品中呈现出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叙述风格,他采用片断拼贴代替线性叙事。相关研究主要有江帆的硕士论文《记忆和遗忘之间的

新家族小说》;王美玲的《记忆是不可能的: 阿诺·盖格的家庭/世代小说〈我们过得还行〉》;李昌珂的《历史与当前》;佟鑫的《最佳父子》等。

总体而言,国内外对盖格尔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特定的主题、作品与人物身上,即主要以《我们过得还行》中的家庭、记忆,《流放的老国王》中的父子关系等为主题,对本文主要研究的《我们过得还行》《流放的老国王》等中的身份认同问题涉及较少。而身份认同问题在当今社会是后殖民主义时代

2 盖格尔作品中的现代奥地利人身份认同问题

身份认同一词来源于拉丁语“idem”,原意是指“相同,统一”。德语杜登词典中给出的词源为后拉丁语时期的“Identitās”。有关身份认同的相关表述,最早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提出的“认识你自己”。启蒙运动后,人们越发关注自身,即个体权利和自由。启蒙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提供了理性、反思和批判工具。自上世纪以来,边缘群体要求话语权,身份认同备受关注。人们使用“身份认同”这一概念来界定“他者”,定义自我。身份认同的悖论在于:身份认同的目的是要将自己与他者所区分开,但是要获得身份认同,则不可避免地要和他者进行互动,从中获得回馈而产生身份认同,他者成了自我的“镜子”,也就是说人对自我的经验总是通过他人获得的。这样

一种过程,被称为“交互反射”。由此,他指出集体认同应该是先于个人认同存在的。集体认同背后是由符号系统和象征意义组成的文化形态。文化要通过循环和展演来实现再生产,在日常生活中,仪式成为了现实世界中联系交往与认同的方式。

文化人类学视角下,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不可能脱离社会大环境谈身份认同。社会认同理论由亨利·塔菲尔、约翰·特纳等人提出和完善,理论认为社会认同有三个基本步骤:类化、认同和比较。首先以《我们过得还行》中的人物为例分析身份认同:祖父理夏德投身特定的社会群体中:政府机关。他以此来建构自己的社会身份。他试图通过获得政府官员的身份来增加自尊,以期超越他的同事和比他拥有更丰富精神生活的妻子阿尔玛(热爱阅读《绿衣亨利》等文学作品),来获得更有利的社会和家庭地位。社会认同理论指出要获得满意的社会认同,群成员必须在主观上认同内群体,成员身份应该被内化为个体的一部分,他人的界定是不够的。然而理夏德并没有获得他所追求的、积极正面的社会认同。当他因为牙疼而无法参加签署奥地利国家公约的庆祝活动的时候,他想到的是照片上将没有他的身影,使他无法参与到“历史成就之中”^①。显然他在意的不是所属群体的成就和自尊,而是他能不能借此提高自己地位和声誉。这说明他没有将他的成员特征内化成功,因而要借助外物来凸显自身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则有两种解决途径:离开所属群体或进行积极区分。由于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是社会认同的基础,社会认同应当给予集体内部成员满足感和积极的反馈,集体认同是参与集体的个人进行身份认同,理夏德没有获得令他满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一认同的构建过程应该是双向的,理夏德单方面的付出,没有及时找准自己在这个集体中的位置,导致最终的结果是失败的。

1989年,菲利普参与过“反对投机商、争取更多居住面积的游行”^②。学校生活是青年寻求信仰的阶段,更多的

社会接触让他急于寻求同伴的肯定。当他对社会强加的角色感到无所适从时,他们就无法在该阶段自我实现,从而放弃并寻找一个能生存下去的方式。而现在的他深居简出,基本上没有社交活动。就连反抗五一正常工作的游行也是被女伴约翰娜强行带去的。人天生就是社会性动物,依赖于群体,所以社会性交往是人的事实需求。人类通过语言构建集体。社会归属感依靠共同的记忆和知识体系建立。然而菲利普和同样说德语的邻居等人依然格格不入,话不投机半句多。菲利普无法融入以同样语言或历史背景构建的群体中,失败的社会融入,导致他无法通过和周围人互动来构建集体认同。但另一方面,他主动要求两个外籍工人带他一起参加远在乌克兰的婚礼。尽管是陌生的集体,但他却试图融入。显然对于以菲利普的标准而言,“他者”并不是来自外国的打工者。扬·阿斯曼提出,个体对集体的归属感(Zugehörigkeit)并不会自动转化成成员间的同属感(Zusammengehörigkeit)^③。这也就意味着民族属性并不是集体认同的唯一选择。尽管同一民族生活在同样的象征体系里,这种共同性未必能够发展出认同,有可能正是恰恰相反。信息化和全球化发展大背景下,文化背景大不相同的人们接触增加,成了民族融合的前提。然而事实上,不同民族的人在交往过程中,其中部分依然会精心维护本民族的特殊之处和界限。不同历史背景下关于民族认同的思考大相径庭,菲利普一家三代人展现出了四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二战初期,祖父希望能以“奥地利人”的身份死去而舅舅则为成为“德国人”兴奋;二战结束后,父亲绝口不提过去和纳粹的联系;出生于20世纪的菲利普则对这些毫不在意。这说明了个人身份认同的危机和集体行为之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存在着一定关联的,集体认同作为整体优先于个人存在,并对个体认同产生深刻影响。但也正是每个特殊的个体构成了一个集体。

社会需要“过去”,来定义自我形象,解释了集体记忆对集体认同的重要

性。象征着过去的物品被束之高阁,回忆被封存。被放在阁楼上的杂物似乎总存着别的心思,就是有朝一日,还有被重新需要的可能。家宅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场所之一,对人的身份认同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许多特定的行为都仅限于这个场合。这个空间并不仅仅指由外墙围起来的别墅本身,也包括房子中的一些细节,例如角落、零碎的物件等等。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东西能看出收藏者的性格,组成了这个复杂的空间。别墅主人的身份认同我们也可从中探知一二。毫无疑问,这两者是互相影响的。他们的个性特征被带入零碎的物件,零碎的物件所又成了他们身份认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 身份认同问题的深层内涵

Erik Erikson(1902-1994)将人的发展分为八个阶段:(1)婴儿期,(2)儿童期,(3)学龄初期,(4)学龄期,(5)青春早期,(6)成年早期,(7)成年期,(8)成熟期。Erikson曾在他的作品《童年和社会》中提出“同一性危机”。他指出,在任何一个阶段无法顺利解决该阶段核心任务都会导致下个阶段的危机。青春早期阶段(12-18岁)是同一性形成和发展的关键阶段,青少年在面对新的社会冲突和要求时,可能会面临角色混乱和本能冲动的危机。身份认同问题最明显的是亲密性危机,一类是无法建立人际间的亲密关系,另一种是乱搞亲密关系。无论是哪一种其实都代表着无法找到能与自己分享的身份认同真正的亲密。^④尽管菲利普有一位情人,但他们的关系更多建立在违背道德的情欲之上。他拒绝约翰娜进入他的内心,就像他拒绝他的整个家族。他的这种行为可以说是他父亲的缩影。个人认同涉及社会分配给个人的角色、性格、能力等,是被社会建构的产物,具有文化意义。扬·阿斯曼认为,个体身份认同的形成和发展也要通过反思完成,这意味着一个人要构建个体的认同必然要在交往和互动中完成。家庭,是每个人最早接触到的可交互集体。在他成长过程中,母亲的缺席以及父亲的“虽然在场却像不在场”对他的个人认同产生了

极大影响,他本该在家庭生活中学会与人合作。伴随着对别墅的整理,菲利普接触到更多的家族记忆,对整个家族的疏离感渐消,逐渐融入了这个集体,更加表现了记忆对身份认同的重要性。菲利普放下了他在奥地利的的生活,选择跟随两位工人回到乌克兰参加婚礼,可以看做是菲利普对过去的接受和道别,也是他尝试与其他人建立互动和亲密关系的起步。单从地理上来看,乌克兰处于一个很微妙的位置,它位于东欧,冷战时期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如果说菲利普尝试解决自己身份认同的问题,是向东边的乌克兰寻找新的认同。回顾奥地利的历史,曾经辉煌的奥匈帝国也有过位于东欧的领土。那么针对菲利普的选择而言,并非完全无迹可寻。民族融合的前提下,不再以国籍、地理位置来判定身份认同。无论危机是否能被解决,至少菲利普展现出了积极寻求可能解决途径的态度。断裂和传承并存的代际关系正是现代社会中延续家族记忆的核心。

《流放的老国王》中,父亲因为阿兹海默症失去了一部分记忆,他只停留在某一阶段。他忘记他已经安全从二战战场上回家,反倒一直提出“回家”的要求。回忆的缺失同样会导致身份认同问题。显而易见的后果就是身份认同的混乱。是否能够再重新建构新的身份认同是年老时的新的同一性危机。老年阶段本来

的任务是将过往整合。阿兹海默症使得克服这个危机的几率变得更加渺茫。人活在社会制度和训练中,通过将某种影响延伸到下一代,寻求解决危机的可能,完成生命循环。生命的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任务和衡量标准,目的是将各方面都发展到“成熟”。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发展到成熟。^⑤在生命周期的末尾,父亲反而从“成熟”退化回了“幼稚”。如果说从“幼稚”到“成熟”再到“下一代”是生生不息的循环,那么在生命周期的末尾,父亲反而从“成熟”退化回了“幼稚”,他自己就完成了循环。这未尝不可看作是对父亲身份认同的“最后的关怀”。他以一种退让的方式完成了超越同一性极限。

4 结语

事实上,研究身份认同问题,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社会、心理、文化、政治等权力话语。如果我们将盖格尔笔下的家庭小说和传统的德语家庭小说作对比,如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发现,纵然盖格尔还是讲述的家族、代际的过往,但最终的落点已经不再是一整个家族的兴衰了,而是落到了象征这个家族未来发展的那一个年轻人身上。也就是说,聚焦群体的目光转移到了个人身上。这也正暗合了现代社会越来越注重个性化和个体化的趋势。复杂、多样的现代社会带

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人们不可避免地遇上危机,身份认同不仅成了目的,也成了一切的基础。

[基金项目]

四川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市级一流学科2020年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阿尔诺·盖格尔作品中现代奥地利人的身份认同危机”(项目编号:SISUWYXY202021)。

注释:

①【奥地利】阿尔诺·盖格尔著;陈民译.《我们过得还行》,S.10,上海三联书店,2008.6,上海.

②同上,S.232.

③【德】扬·阿斯曼著,金寿福、黄晓晨译,《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S.138,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5,北京.

④【美】埃里克·H·埃里克森著,孙名之译,《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S.121,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6,杭州.

⑤同上,S.126.

[参考文献]

[1]张云鹏.盖格尔“审美价值的主观性”研究[J].昌潍师专学报,2001(01):10-14.

[2]孟瑞.“身份认同”内涵解析及其批评实践考察[D].浙江大学,2013.

[3]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葛奇.奥地利人的评论[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3(12):33-34.